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批判性

许瑞涛*

〔摘要〕 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中“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秘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科学研究。如何将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既定的历史事实真实地反映在观念中,成了马克思科学研究的关键。为此,马克思反思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肯定了“合理抽象”的重要性,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抽象性和黑格尔观念论的幻觉。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既定的历史性事件是一个独立于理论抽象之外的“实在主体”,它总是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思维在把握这一“历史性事件”时,不能直接将之呈现于理论中,只能借助“最简单的规定”在思维中予以再现。因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把握具体的特殊方式。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合理抽象;思维具体;先验结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首次将他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作了科学论述。在批判普鲁东之前,马克思先对德国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了某些评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了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①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中物化状态的实证描述;以物代替人是对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遮蔽,这是对“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确认。黑格尔不满意这种物化状态,试图以观念的理性力量来将其扬弃;不过,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上”^②,最终落入了“抽象统治”的窠臼——观念的东西成了实在。在马克思看来,“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③。因而,为了揭露“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秘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性研究。

批判意味着反思与超越。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中,马克思发现这些经济学家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他们解释了生产运行的社会关系,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同样在对黑格尔哲学的反思中,马克思发现在黑格尔哲学中逻辑范畴作为感

*南开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300071。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16ZD097)阶段性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性具体的抽象物成了实体,这一颠倒使现实世界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①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历史性和颠覆黑格尔观念论的幻想,马克思重述了政治经济学“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②。以往学界关于这一方法的讨论,大多当作一个认识论问题来分析,这是对马克思此处方法论自觉的忽视。

为了揭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的批判性,本文重现了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分析。主要包括:对“合理抽象”的肯定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抽象性的反思,对范畴间“差别”的强调和对构筑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如何安排经济范畴次序问题的理清,对“思维具体”与“实在主体”的辨析和对黑格尔观念论幻觉的澄清。

一、从“合理抽象”到“思维具体”

在庸俗经济学对资产阶级社会“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时,马克思却要真实地、历史地把握和观念的呈现幻觉背后的实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应是现实物质关系的观念表现,即“思维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在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问题是,感性具体如何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

面对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既定的事实,马克思发现,首先面对的是物质生产与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③。于是,马克思以社会性物质生产为对象展开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设定这一出发点,蕴含着对黑格尔理念主体概念的批判,对脱离社会的抽象个人观念和超历史的生产一般的批判。

生产是社会中有个人的活动,因而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生产;同时,生产的一切时代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定。抽象出一个“生产一般”的合理性是为了减少研究中的重复。然而,生产一般是经过比较抽象出的共同规定,它本身有许多组成部分;在借助生产一般考察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的生产时,绝不能忽视历史差别。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规定性是存在的,然而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④是一种抽象,用它不可能理解现实的历史。这样,马克思有条件地承认了“生产一般”这一“合理抽象”,并反思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使用的方法。

马克思表明,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国家时始于实在与具体。如果直接从“整体的表象”(如人口)开始,通过分析得到的是“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这条道路作为从整体的表象到抽象一般的方法,表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⑤。这是经济学于其产生时期在历史上所走的道路。以17世纪经济学家们为例,马克思批判了这第一条道路的抽象性。他们从整体出发,通过分析得到抽象一般关系,再用这些抽象关系超历史地构筑起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他们在使用这些抽象规定时遗忘了重要的一点,即抽象规定本身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⑥。因而,他们利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生产,得出的结论是抽象的、超历史的。

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方法进行反思后写道:如果从“表象中的具体”开始,经过抽象直到“最简单的规定”(范畴),至此“行程”回头直至重现具体,由此而得的是一个有着诸多规定性的“总体”^⑦。马克思认为,最简单的规定是经过分析得到的一些“合理抽象”,它能够避免研究中的重复;不过,马克思并未遗忘最简单的规定是由不同规定的东西抽象而来。马克思发现抽象规定与现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7—139页。

②③④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22、29、42、26、41页。

的感性具体之间并非是直接等同的,二者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即后者是一个总体,而前者仅仅是某个单一侧面。思维把握具体需要借助抽象范畴,而在凭借抽象范畴真实地反映现实具体时要依照一定次序来综合诸规定性。思维的行程需要在得出最简单的规定后回过头来,以便重拾具体的诸规定性。沿此道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此乃马克思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也即政治经济学的“第二条道路”。

遵循政治经济学“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以感性具体为前提,思维抽象出“最简单的规定性”,由此开始重拾具体总体丰富的规定性,这样作为思维行程的结果,感性具体最终变成了在精神上再现的“思维具体”。

二、对经济范畴的历史顺序与逻辑次序的辨析

在思维掌握并再现具体的进程中,由“合理抽象”所得的“最简单的规定性”开始重拾具体总体丰富的规定性时,必须正确处理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别”。这一问题表现为,在构筑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如何安排经济范畴的次序?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理清,是通过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的关系以及简单范畴适用的充分性问题的辨析完成的。

首先,马克思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例分析了简单范畴与具体范畴之间的复杂关系。马克思认为,作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交换价值的前提是存在一个既定的整体;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马克思发现,“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即它可能在比较具体的基础产生之前曾经存在过。借助对占有和所有权的分析,马克思发现:简单范畴表现的关系是“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②;然而发展了的具体则把它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此外,马克思还发现,简单范畴在历史上只有于最发达社会状态之下才体现充分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③。以秘鲁为例,它在被西班牙征服之前不存在任何货币,不过它却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以斯拉夫公社为例,货币交换只是出现在公社边界处。货币只是在古代商业民族中才处于支配地位,而在古典古代时期,它只出现在共同体解体的时期;实物租和实物税仍然是罗马帝国最发达时期的基础。由此,马克思总结道:“简单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具体范畴之前存在,但是,比较简单的范畴只能在一个发达的社会形式中才能获得的充分发展,具体范畴在一个不发达社会形式中却可以有比较充分的发展。”^④

接着,马克思以作为劳动一般的“劳动”这个简单范畴是一个现代范畴为例,说明了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才能产生“最一般的抽象”。在经济学对财富源泉考察的不同阶段,财富的源泉被看作不同的事物。货币主义在货币中发现了财富的源泉(客观的物);重商主义视财富的源泉为获得货币的主体活动,重农主义则把财富的源泉看作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亚当·斯密直接把劳动视为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则认为,“劳动一般”这个抽象是以各种具体劳动获得充分发展所组成的具体总体为前提,其“揭示了资本的本质,认为资本是对他人劳动及其成果的私有权和支配权”^⑤,换言之,抽象的规定性是以一个历史产物——具体总体——为前提,“最简单的规定性”唯有在该条件之内才体现充分适用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发现范畴具有两种次序:一方面是各个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性生产形式中表现出的先后次序,即经济范畴的“历史顺序”;另一方面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总体的内部结

①②③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43、44、44页。

⑤吴学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劳动思想的奠基之作》,《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构中不同的范畴表现出的结构次序,即经济范畴的“逻辑次序”。在借助范畴构筑关于资产阶级生产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即如何安排经济范畴的次序?由于简单范畴只有在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才具有适用的充分性,因而,首先需要对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最发达的和最多样的生产组织进行解剖,这包括结构性和历史性两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发现资产阶级生产组织是一种对抗形式,而这一对抗形式又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并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劳动与生产条件的分离作为资本关系运行的关键,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有其历史基础,其中有以往社会形式中的保留成分,也有改造成分。考虑到理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将关于资本历史条件的分析纳入对资本关系的考察范围。他指出,“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①。这样,理解过去便成了马克思“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从另一方面来说,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解便可“透视”一切已经颠覆的社会形式,此即马克思所谓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②。对于这一“透视”,马克思有两点说明:第一,对资产阶级经济的剖析可以为理解古代经济提供钥匙,但是,不能抹杀一切历史差别,否则,就会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把资产阶级社会形式普遍化为一切社会形式;第二,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自我批判时,才能借助“最一般的抽象”理解以前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即借助人体的解剖来解剖猴体,不过猴体解剖是为了更好地解剖人体。在此意义上,才能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的狭隘性,避免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理解。

其次,马克思发现,各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生产,它是一种“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③这就表明,流变的历史具有不同特征的阶段,每一特定阶段的特征由此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所决定。因此,在考察具体总体的内部结构时,就必须按照此阶段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来安排范畴的关系。例如,土地所有制在资产阶级社会前后的变化,农业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个工业部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资本,因此资本必须既成为起点又要作为终点,必须在说明土地所有制之前先进行说明。^④因此,从土地所有制开始分析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错误做法,这看似符合历史演进的顺序却不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逻辑结构。马克思就此指出,按照历史次序排列经济范畴是错误的,应该按照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其顺序,这种关系与其历史次序恰好相反。^⑤

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在构筑关于资产阶级生产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如何安排经济范畴的次序问题。换言之,在思维掌握并再现具体的进程中,由“合理抽象”所得的“最简单的规定性”开始重拾具体总体丰富的规定性时,不同范畴之间的“差别”就得到了正确对待。这样由思维掌握的具体总体就在精神上以思维具体的形式得以再现。如此一来,思维借助“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实现了对具体总体的掌握和精神上的再现,同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用的方法的抽象性和结论的超历史性都得以克服。

三、类“先验结构”作为思维进程的结果

以上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抽象方法的批判,这只是他重述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的工作之一,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黑格尔思想中呈现颠倒的观念论幻觉。在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解剖资产阶级生产组织时,马克思发现科学研究必须占有材料并研究各种形式的内在联系,如此才能适当地叙述

①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3、47、48、49、49页。

现实运动。材料的生命一旦反映在观念上,呈现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结构”^①。这个类似的“先验结构”,在马克思看来,是思维综合的过程和结果。

当庸俗经济学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感到很自在时,如何揭露表象背后的实在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马克思意识到,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不能通过“直观”表象背后的具体,而只能从“抽象”的范畴出发,才能在理论中重构具体的真实情境。抽象-具体这一对概念在辩证法中扮演着独特角色,马克思正是借助辩证法建构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因而,“抽象范畴”在马克思思想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观念。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在面对“抽象范畴”时,颠倒了思维与实在的关系。在黑格尔哲学中,现实的实在是“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②,于是,他“把定在即现在存在于此处的事物把握为由已经存在的事物所再生产出来的”^③,定在成了本质的实存。黑格尔的哲学方法作为分析与综合的统一^④,表现为“精神经验自身”的辩证运动,这一行程所内含的逻辑结构是一个自足的圆圈。外在事物的独立性被革除,存在的本质被归之于观念,在此意义上,事物成了观念外化的特定形态,其实在性也被观念占有。实在所表现出的分裂从而内含于观念外化的过程,并通过观念返回自身而获得统一。在李嘉图把人变成帽子后,黑格尔将帽子变成了观念。总之,在黑格尔思想中,“感性具体”作为观念对象化的产物只是绝对精神的实现形式,这样,观念与实在的关系就被颠倒了。

抽象范畴只是思维用来把握具体的工具,“实在主体”则是理论抽象的前提。据此,马克思厘清了“思维具体”与“实在主体”的区别。一方面,思维具体是思维进程的结果。被思维所把握的并在精神上再现的具体总体,作为思维综合的过程和结果,是经历了思维的行程后“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它才被称作“思维具体”。不过,“思维具体”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⑤,它决非概念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其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⑥。“思维具体”是思维的产物,思维着的头脑只是以它的专有方式把握世界。另一方面,实在主体是理论抽象的前提,即在思维借助抽象范畴把握具体时,“实在主体”仍在这个“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的头脑之外保持独立性。主体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都是既定的,范畴只是表现了主体的存在形式的个别侧面。同时,作为“最简单的规定”获得适用的充分性的前提,具体总体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最现代的生产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才为“生产一般”这一“合理抽象”提供充分的历史条件。这样,在用经济范畴构筑关于资产阶级生产组织这一历史性的生产形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马克思在黑格尔自足的圆圈式逻辑结构中发现,总有先行发展的历史性事件。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科学性更加明显。“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作为具体-抽象-具体的行程,是“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的综合。^⑦从认识论层面看,这条道路包含了黑格尔的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⑧,不过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它却有着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从方法论层面看,思维只有借助抽象范畴才能科学地掌握具体,与此同时,实在主体始终保持独立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之所以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在于其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自觉;换言之,忽视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论自觉,则难以揭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性。

①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2、22页。

②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2、42—43页。

③[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2页。

④[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4页。

⑦[日]见田石介:《〈资本论〉的方法》,沈佩林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⑧参见[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第412、413页。

科学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借助“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才能剖析各种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才能把现实的运动叙述出来,这一点完成后,材料的生命就会在观念上反映出来。这样,作为思维进程的综合与结果,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类似的“先验结构”。值得注意,这个类似的“先验结构”并非思维的任意创造,而是思维掌握具体并在精神上再现感性具体的结果,也就是思维凭借抽象范畴对具体(总体)的综合与再现。

四、结论

为了揭露资产阶级社会中“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秘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作了科学研究。如何将资产阶级社会这一既定的历史事实真实地反映在观念中,成了马克思科学研究的关键。为此,马克思反思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明确了“合理抽象”的意义和限度,同时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方法的抽象性和黑格尔观念论的幻觉,前者因为对范畴间“差别”的遗忘而只能超历史地运用“抽象一般”,后者则颠倒了观念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的关系而将观念看作实在。在马克思看来,思维要想掌握具体需要分析各种发展形式的内在联系和在精神上重构具体总体丰富的规定性,这一工作只能借助“最简单的规定”这一“合理抽象”才能完成;同时,马克思意识到“合理抽象”有其限度,即思维在借助抽象范畴分析与综合各种规定性时不能忽视各个范畴间的“差别”。于是,通过对经济范畴的“历史顺序”与“逻辑次序”的辨析,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构筑关于资产阶级生产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如何安排经济范畴的次序问题。最终,作为思维行程的综合和结果,具体总体就在精神上得以再现。如此一来,“现实的运动”得以适当地叙述,“材料的生命”得以观念的呈现,所呈现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结构”。总之,“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掌握具体并在精神上再现具体的特殊方式;这一方法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在于马克思此处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自觉。

(责任编辑:杨嵘均)

The Critical Force of Marx's Method for Political Economics

XU Rui-tao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ose the secret of “people's being subject to things” in a bourgeois society, Marx investigated the bourgeois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key to his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is how to describe the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had been an established fact historically. Therefore, Marx affirmed the importance of “reasonable abstraction” when he reevaluated the method adopted by the bourgeois economists. Meanwhile, he criticized the abstractness in the bourgeois economists' method and the illusion caused by Hegel's idealism. In Marx's opinion, the bourgeois society, which has been an established historical fact, is a “concrete subject”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and forms the precondition for any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This historical fact, when our mind wants to grasp it, cannot be presented directly in the theory but can only be represented in our mind through “the simplest stipulation”. Therefore, the method of “ascending from the abstract to the concrete” is a special way in which our mind grasps the concrete.

Key words: political economics; economic category; rational abstraction; the mental concrete; transcendental structure